

中国边疆研究通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编

主编 邢玉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前　　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便于协调、组织全国边疆史地研究,于1987年开始主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下略作《报告》)杂志。《报告》陆续发表的以中国近代边界沿革研究为主的文稿,受到中国边疆研究者和有关部门的重视。1994年,《报告》因种种因素而停办,这使与《报告》情结太牢的我们遗憾多多。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学科调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被列入重点扶持学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九五”科研组织规划中确定研究工作重点有三:

1. 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基础,开展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的综合性研究,加强中国历代边疆政策和近代界务交涉的专题研究。

2. 开展当代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的对策性和预测性研究。

3. 开展中国边疆理论研究和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前者包括陆疆、海疆与边界的理论问题,通过中外理论的比较、历史与现实的贯通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探索中国边疆历史发展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发展规律。后者侧重基础理论,包括概念与范畴、学科性质和任务、体系与功能等等,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

研究重点拓宽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季刊,公开发行。下略作《研究》)显然已不能完全满足研究者所需。因此,我们便决定原则上每年编辑1部名为《中国边疆研究通报》(下略作《通报》)的论文集。其目的,固然在于继续推动中国边疆研究,为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同时也在于回报曾对《报告》多有青睐的读者。虽然我们在做出上述决定时还未达到游目骋望的认识高度,但是马上意识到《通报》作为公开出版物不应当是《报告》的翻版,也不应当是《研究》内涵的简单扩大。显然,我们必须不断探求和试炼。从这部《通报》开始,我们坚持以更具包容性的态度,让《通报》的涵盖面广泛些,让《通报》既能揭示历史的真相又能展现今日诸多问题的根源和历

史教训，从而更紧扣时代的动脉、激荡读者对中国边疆古今情势和样相的思索。

《通报》主要发表下列研究论文：①中国陆疆和海疆的理论与实际研究；②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和中外界务交涉研究；③中国历代海事和当代海疆现状研究。有关上述各方面的研究综述和档案、资料则以少量篇幅加以介绍。《通报》着重选发能使读者于中国整体边疆的各个侧面，知其闻世之事所缘起、见世之事所滋延、未来之事所究竟的文稿。

论往事，前鉴不远；述颠末，考镜得失。愿广大读者细览《通报》而深长思之。

在此，我们对鼎助《通报》出版的新疆人民出版社表示由衷的感谢；对赐稿于《通报》的作者和《通报》的读者道一声谢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95年10月

目 录

前言

略论当代中国边疆的稳定与发展	马大正	(1)
关于中国边疆的若干问题	邢玉林	(8)
处理当今边疆地区社会矛盾热点的探索	赵廷光	(18)
云南禁毒斗争的现状与对策	赵志明	(23)
西双版纳的历史演变及对外开放战略	郑汕 田虎青	(28)
《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中的“旧有卡伦”	李之勤	(34)
清政府对黑瞎子岛的管理与“耶”字界牌问题研究	刘远图	(40)
关于论证中印东段国界资料的一些线索	曾世英	(54)
近代中印东段边界史略	房建昌	(56)
“中国威胁论”与英属印度的“战略边界”	吕昭义	(81)
中老边界历史形成探微	李国强	(101)
阿佤山区中缅边界问题的产生与解决	罗之基	(114)
海疆、海防与海洋权益	毛振发	(122)
海洋法公约与现代化建设	赵建文	(129)
海洋法公约与海洋防卫	申长敬 吴天喜	(134)
·研究综述·		
中朝韩三国关于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的研究	杨昭全	(137)
·译文·		
俄罗斯学者对俄中关系及边界领土问题的理解	[俄]华可胜 著 阿拉腾奥其尔 译	(15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及编印图书、期刊一览		(165)

A Bulletin on China's Borderland Studies

Content

Fordword

Some Ideas on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s Borderland	Ma Dazheng(1)
Some Issues on China's Borderland	Xing Yulin(8)
Exploring into the Treatment to Central Issues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ontemporary Borderland Areas	Zhao Tingguang(18)
The Current State of and Policies in the Drugs - Banning Struggle in Yunnan	Zhao Zhiming(23)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Xishuangbanna and its Opening - up Strategy	Zheng Shan Tian Huqing(28)
The "Old Garrisons" in the Sino - Russian Treaty of Abagaytu Boundary	Li Zhiqin(34)
The Management of the Heixiazi Island by the Qing Goverment and a Study of E (je) Boundary Marker at Issue	Liu Yuanlu(40)
On Some Clues to the Data on the Eastern Sino - Indian Border	Zeng Shiying(54)
A Short History of the Modern Eastern Sino - Indian Border	Fang Jianchang(56)
The "Views of Chinese Threat" and the "Strategic Border" of British India	Lü Zhaoyi(81)
An Exploration on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the Sino - Laos Border	Li Guoqiang(101)
The Rise and Settlement of the Sino - Burmese Border Issues in the Awa Mountainous Areas	Luo Zhiji(114)
Coastal Areas and Teritorial Seas, Coal Defense and Marine Rights and Interests	Mao Zhenfa(122)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and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Zhao Jianwen(129)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and Coat Defense	Shen Changjing Wu Tianxi(134)

A Summary of Studies

The Studies about the Sino - Korean Border and its Negotiations in Beijing, Pyongyang and Seoul	Yang Zhaoquan(137)
--	--------------------

Translaiton

Russia - Chinese Relations and Border - Territorial Problen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Russian Scholars (Russia) Voskrje sjenskij, A. D. trans. by Altan - Ochir(151)	
A Guide to the Publications by the Center for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65)

略论当代中国边疆的稳定与发展

马大正

一、关于中国边疆地区的界定

边疆，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国内外文献作出的解释是很相近的。一般都解释为“靠近国界的那个地方”，有的说：“边疆，边境之地”^①。有的则写道：“边疆，靠近国界的领土”^②。在外文辞书中，边疆是指“一个国家的遥远地区”^③。总之，中外文献中，把边疆解释为一个国家比较偏远的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

边疆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与海疆，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有一定宽度的地区，必须具备下述条件的地区才可称之为陆疆地区，即一要有与邻国相接的国界线；二要具有自然、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据此，当代中国的陆疆省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把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黑龙江、吉林、辽宁、云南等省都视为陆疆地区。因为内蒙古自治区虽然从人文方面看是蒙古族普遍居住的地区，从历史方面看也有它发展的整体性和特殊性，但阴山山脉横贯其间，使山南与山北地区在自然条件、历史与人文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实际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将阴山山脉以北地区作为边疆地区并考虑到行政区域的完整性，应把横跨阴山山脉的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也都作为边疆地区，是较为合适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深入内地的桂林、梧州地区，亦不应作为边疆地区。黑龙江省南部哈尔滨市及其周缘地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和集安市以外地区，辽宁省丹东地区以外地区和云南省治国县诸州和地区以外地区，亦不应视之为边疆地区。简言之，凡是有国境线的边境县的总和是当代中国狭义的边疆地区。顺便提及，在当今人们习惯中，也有将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贵州等省称之为“边疆地区”，其实这是不确切的。我们可以称它们为“边远地区”，但不能称之为边疆地区，因为这些省区均不具备与邻国相接的国界线。

边疆又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秦始皇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以来，出现过多次大一统局面。秦汉王朝开创了全国统一的先河，隋唐王朝疆域的开拓，扩大了中原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边疆地区的联系，实现了“华戎同轨”，“冠带百蛮，车书万里”。宋、辽、金之际，汉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意识，各族人民克服了战争造成的种种困难，内地和边疆的开发与交流进一步发展。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开创了我国少数民族一统全国的先例，中原和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族本身，发生了近代

① 《辞源》（商务印书馆修订版），合订本，页1683。

②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64。

③ 《苏联大百科辞典》（1985年版），页1205。

百年富有特色的大融合，改变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传统结构和狭隘观念。及至明、清，特别是清朝前期，清政府在元、明两代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全国大一统。清初划分 18 省，即直隶、山西、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福建、陕西、甘肃。其中云南、广西，以及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虽划入 18 省，但地处边陲，与邻国接壤，清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政策与内地有区别；除上述地区以外，一般都视为边疆地区。由此可见，清代边疆包括：东北 3 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台湾、海南岛及南海诸岛，基本上形成了现今的疆域范围。

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有战乱、有分裂，但每次战乱和分裂，都为下一时期更大范围的统一和发展准备了条件。因此，在讨论历史上的边疆问题时，应考虑如下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首先是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相连接的省区；其次是以此为基础，上溯古代，参照历代封建王朝边疆的实际情况予以综合考察。这就是说，当代的中国边疆与历史上的中国边疆有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但当代中国边疆又不能与古代的边疆简单地划等号，因为中国古代疆域呈现着稳定性与波动性相结合的特点。

二．关于中国边疆地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 2.2 万公里边界线内侧的中国边疆省区，正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

由于我国基本国策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也由于中国边疆省区的战略地位实现了由“反修、反帝”国防前线到国防前线与对外开放前沿为统一体的战略转变，因而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边疆地区与国家在发展方向和经济利益上有了更多的交汇点。

国内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给边疆地区提供了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极好时机：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增加了国家在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支持边疆地区的实力，边疆地区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日益发挥着对沿海和内地的重要支持作用。

有约 30 个少数民族与 15 个国家相同民族毗邻而居，多年来对原苏联、越、印等国的对抗和战争局面已转变为和平环境，不少周边国家谋求发展本国经济，这些国家与我国尤其是边疆地区在经济上有着较强的互补性。

当前中国边疆地区在前进道路上也遇到了种种严峻的挑战。

在经济上，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局面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变。1991 年，内蒙古、广西、云南、西藏、新疆 5 省区人均社会总产值、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全部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上述省、区的边境市、县平均发展水平更为落后，绝大多数地区的人均经济指数都低于各省、区人均水平，如新疆 33 个边境市、县人口占全区总人口数的 28.1%，而 1991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全区国民生产总值的 15.81%，社会总产值只占全区社会总产值的 13.63%，国民收入只占全区国民收入的 16.23%，财政收入只占全区财政收入的 13.8%。云南 26 个边境市、县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相当于当年全省人均产值的 61.6%，其中人均工业产值仅相当于当年全省人均产值的 30%。边疆地区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云南 26 个边疆县、市中有 14 个为贫困县，占边境市、县总数的 53.83%。新疆列出的重点扶贫县 27 个，大部分集中在边境地区。总之，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起点很低，自我发展的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薄弱，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文化上，边疆地区文化教育整体水平低下和文盲率高的现状，也是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

扭转的。据 1990 年统计,在多民族的 8 省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中,男性总数的 1/3、女性总数的 1/2 以上是文盲或半文盲。

在政治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的大团结,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当前边疆地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大局是好的。但不容否认,影响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消极因素是存在的,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反分裂斗争是边疆地区的长期任务;二是缉毒、缉私斗争在维护边疆地区稳定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周边环境上,国际政治格局由两极向多极的转化和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产生了新的竞争。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与我国(特别是西南边疆地区)在资金、原料、市场、人才等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与我国毗邻的东北亚、北亚、中亚、南亚地区诸国的社会政治结构正处在重组、发展不稳定或存在巨大问题的时期,他们政局的动荡和国家间的矛盾均会对我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对外开放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印度、越南等邻国与我国还有历史造成的领土争议问题尚待解决。

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三. 关于正确处理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这里说的稳定是指社会稳定,这里说的发展是指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有赖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必须有社会稳定作保证。以发展求稳定,以稳定保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辩证关系。

发展经济,是边疆地区的首要任务。要使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是要搞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边疆地区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沿边开放战略,是党的十四大确定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 1992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把扩大陆地边疆的对外开放,作为我们整个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

我国边疆地区的沿边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应把沿边开放提高到与沿海开放并重的战略地位。

沿边开放战略的指导思想:从我国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大力发挥沿边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经济互补优势,外引内联,全方位开放,进一步发展边境贸易,积极开拓对周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技术的全面合作,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标准,以开放促进开发、促进改革,带动经济的发展,实现边疆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

沿边开放战略的主要方针:以贸易为先导,发展投资合作、劳务出口、技术交流、合作经济、工程承包等全面的经济技术合作。

以沿边开放为前沿,以内陆地区为依托,以周边国家市场为重点,开拓国际市场。

以出口加工型贸易为重点,发挥当地的优势,形成外向型产业。

以兴边富民为目的,外引内联,东西联合,全方位开放,全面发展。

沿边开放战略的主要任务:调整和优化边疆地区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出口商品基地;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形成出口拳头产品;积极发展劳务输出;积极吸引国外和国内的投资,积极引进短缺的物资和原材料;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快沿边地区市场建设,完善市场体系;转变边疆地区政府职能。

沿边开放的战略布局:建立、巩固和扩大沿边开放带与沿边开放点。开放带的确定和建立

要与周边国家的发展现状和国际区域集团化的趋势相适应,开通第二条亚欧大陆桥,以带动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区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巩固和完善西南沿边开放带、西北沿边开放带、东北沿边开放带,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开放带。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央已批准的内陆口岸、有步骤地选择和确定开放一批新的内陆口岸,形成多中心、全方位,点、带、面相结合的新开放格局。

实施沿边开放战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培养人才、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培养人的工程是一项最具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是这一系统工程的基础,而提高文化教育整体水平和生产技能又是其中的关键。

在边疆地区发展教育事业,要抓紧传统教育体制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展需要的新的体制的转变。国家应改善少数民族学生生活、学习环境,设立专项助学金,使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达到在校生的平均生活水平;适当延长部分有发展前途的学生受义务教育的年限,以使这部分人有可能升入高等院校时在知识和能力方面与其他学生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既要有扶助,也要有压力和竞争,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竞争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除了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针外,重要的是有将上述思想、方针付诸实践的人。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加快经济发展,力量在群众,关键是领导,实质是解放思想,症结是思维方式的变革。思维,一般来说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所谓积极思维,是指面对困难不畏缩,面对差距不气馁,面对问题不悲观,承认落后又不甘于落后,实事求是、积极奋进。而消极思维则表现为狭隘、保守、陈旧、迟钝,看问题片面、近视,干事业畏首畏尾、左顾右盼、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看不到危机,抓不住机遇。因此,对边疆地区的群众和干部,尤其对领导干部要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危机意识、创新意识、风险意识和超前意识的教育和培育。

当然,以发展求安定,并不等于说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了社会就一定会安定。发展只是边疆地区安定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或唯一条件。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还需要与相应的控制手段相结合,才能得到真正的稳定与安宁。这在历史上是有教训可鉴的。民国时期内蒙古德穆楚克标鲁普(即德王)的所作所为,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德王少时就读四书五经,后又频繁来往于内蒙与内地各城市之间,与蒋介石等民国政要多有交往。他在蒙古号召青年喇嘛还俗,并设立毛纺厂,建立牧区学校和卫生组织,但这一切都是为他推行“蒙古自治运动”张本,为他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搞分裂活动增加政治资本和经济实力。所以不能简单地把边疆的发展与边疆的稳定等同,尤其是随着边疆的发展,边疆分裂势力的能量也有可能得到强化。因此,越是在边疆地区发展变化时期,越有必要加强中央在边疆的权威和影响。

四 . 关于维护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

边疆地区的稳定是全国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稳定相对立的是社会动乱。作为一种社会运行形态,动乱一词可作如下界定:动乱是某些人、某些组织、某些阶层的行为越出了社会运行常轨,引起社会秩序混乱,影响社会生产、生活及各方面活动正常进行,并危及国家安全的社会反常运行形态。

从我国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看,诱发社会动乱、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是存在的,局部的、地区性的影响社会稳定事件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反分裂斗争是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期任务。

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不同地区的反分裂斗争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

同特点，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完整、民族团结的原则下，制订灵活的政策、策略。西藏地区和新疆地区是当前我国反分裂斗争的重点地区。

西藏的分裂势力主要来自达赖集团，他们依赖的是以西方大国为代表的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由此，达赖喇嘛在国际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一些西方主要国家和一些重大国际会议上对达赖集团的同情、支持往往呈一边倒的态势，使我陷入被动。

达赖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西藏地区的现实影响和对西藏社会稳定的巨大冲击力主要源于藏传佛教赋予他的神圣地位，特别是班禅大师圆寂后，西藏的僧俗群众宗教认同感有趋向达赖喇嘛之势。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只有很好地解决西藏的宗教问题，才可能真正赢得民心，并有效地控制达赖的影响，求得社会的稳定。

当前在国际上新疆分裂主义势力的影响和能量虽不及达赖集团，但其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却不容低估。

境外分裂势力在新疆的活动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其一，境外几股分裂势力正加紧勾结，寻求联合；其二，妄图使“东土”问题国际化；其三，叫嚣采取武装斗争实现新疆“独立”，偷运武器入境已由过去零星偷运发展成有计划输入；其四，对新疆的宗教渗透呈加强趋势。境内分裂分子活动也日趋活跃，一是非法组织不断出现，二是加紧向我政府工作人员中渗透，三是非法宗教活动继续蔓延，有的党员干部参加宗教活动。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的反革命案件日益突出，且反革命恐怖活动案件增多。自 70 年代末以来，新疆（主要是南疆地区）陆续发生了由分裂主义分子煽动的多次小范围的骚乱和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搞恐怖活动是新疆分裂主义势力的新手段和新特点。

分裂主义分子狂热地鼓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挥舞伊斯兰圣战和重建东土耳其斯坦旗号，由于民族的、宗教的原因，对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些民族的群众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同时我们对正在崛起的大哈萨克主义对我哈萨克族群众的负面影响也不容轻视。

对于西藏和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几点认识：

1. 在世界两极格局终结的大气候中，民族主义的抬头与宗教势力的泛滥已成一股浊流。这一浊流既为终结两极格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又成为当前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一种重要因素。我们在认识和分析边疆地区分裂活动现状时，必须考虑到当前这股浊流存在和影响的国际大背景。

2. 反分裂斗争的成败得失，关键在于争取群众。当地各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群众是我们反分裂斗争的主力军和依靠力量。我们强大的祖国和军队是他们的后盾。在依靠干部和群众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和分化达赖集团中一切可以争取和分化的力量，逐步达到孤立他们的目标。在斗争策略上要尽量缩小分裂势力的影响。边疆地区在反分裂斗争中，要强化国家意识，淡化民族意识。

3. 在反分裂斗争中既有政治问题，又存在着大量意识形态方面问题，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因此，正确处理边疆民族地区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十分重要的。必须划清搞分裂主义的主要骨干与上当受骗、有一般错误言行的群众之间的界限。要持续不断地、广泛深入地向各族干部和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遇到民族之间的纠纷时，切忌把具体问题与民族问题连在一起，应该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4. 解决好宗教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新疆地区，我们面对几乎是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群众，认真、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特别重要。要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尤其是在已经出现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合二为一、互相烘托的情况下，更应营造宽松气氛，防止

激化矛盾。应该承认宗教存在的客观现实,真正在思想上把僧侣看作信教群众,而不是简单地置之于不顾。应当支持寺庙以寺养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给予一定的生产资料,一方面解决寺庙和僧侣的生活困难,另一方面将寺庙向世俗方向引导。将寺庙的管理、经营、发展权下放给寺管会,改变政府什么都过问什么都没管好的状况。政府只进行宏观管理,管好政治、主要人员,给各寺定编、定责,让寺管会切实负起责任来,具体的人员招收、僧人管理、纪律奖惩、学经研经、经营开发由寺庙自己去办。重建和加强寺庙学经研经系统,鼓励僧人研究经典,发展宗教文化,恢复传统宗教学术阶梯,对宗教造诣高、威望高的老僧侣给予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惠。

第二,贩毒、走私等丑恶行径,在云南、广西边境地区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1992年,云南省缴获毒品5吨,其中海洛因4吨多,占全国收缴毒品的九成以上;破获毒品犯罪案件5000多件,抓获贩毒人员7000余人,其中判死刑的464人,判死缓和无期徒刑的逾600人。1992年8月31日,云南省委、省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文山两县结合部的平远地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严厉打击贩毒贩枪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共清查出犯罪分子854人,取得了重大胜利。广西缉毒部门1988年以来,共破获贩毒案件146起,摧毁跨国贩毒集团30多个,抓获贩毒分子330余人,缴获毒品18.0832万克。

走私武器给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和事故隐患,甚至殃及台、港、澳地区。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武器走私中比较常见的是我国产的“五四”和“六四”手枪(即流行于港台的“黑星”、“红星”手枪),有时也有轻型冲锋枪。这些武器大多是通过中越边境—南宁—广州—台、港、澳和中越边境—南宁—大陆内地两条渠道流通的。广西边防的军警民部门都成立了流动巡逻队,严厉打击军火走私。由于边境情况复杂,走私渠道多,这些年来从越南走私的武器到底有多少流入我国,难以精确统计。各种刑事犯罪及违法行为如走私、贩毒、私藏武器、贩卖人口及抢劫、凶杀等侵犯公民人身安全等已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事业的严重障碍,甚至干扰、阻碍执法。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采取严密措施,防止毒品、武器走私,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分子;同时,要加强对广大群众遵纪守法的教育。

五. 关于历史经验的总结

从边疆治理的角度,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有自己的边疆问题,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的封建统治,制定、实施了治理边疆的政策,以实行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守住一条线(边界线),是历朝边疆政策的基本目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明诸统一王朝的充实、完善,至清代形成了完整体系,可以说是集中国封建社会边疆政策之大成。清代前期边疆政策实施的成功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奠定起了重大的作用。

历代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不仅与各代各朝的存亡兴衰休戚相关,而且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时至今日,古代边疆政策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安定,仍是一份有待认真总结、批判继承的重要历史遗产。

但是,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加剧,清王朝综合国力下降,中央政府治边决策失当,连年多事、被动挨打、丧权失地,教训惨痛。为什么清前期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面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由成功的巅峰跌入了失败的低谷?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察、认真总结的历史大课题,于当今治边也极有借鉴意义。

中国近代边疆面临严峻形势,概言之:一是内忧外患并存,且互为因果;二是海疆与陆疆全

面危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清政府面临的对手由原来落后于己的国家或部族，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主客观因素决定了晚清至民国，在治边战略方针上存在严重问题，概言之：一是领土主权意识薄弱；二是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者始终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三是对治边战略中海、陆防两个方向的关系处理失当；四是始终没有形成一支能应付边疆危机的治边人才群体，等等。尽管在鸦片战争的百年间，治边举措上并非一事无成，也不乏卫国英才可歌可泣的活动，但从总体上看，在列强侵逼下，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割地丧权的条约，边界内缩，部分国土沦丧。与此同时，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反抗外敌的斗争与分裂主义分子的叛乱活动、东西方列强的广泛渗透相互交织在一起，风波四起、险象环生。

中国近代治边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失。我国与某些国家的边界争议多是这段历史遗留的问题；新疆、西藏、蒙古等边疆地区一些不稳定因素的形成也可追溯到清末民初。至于边疆地区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十分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尚未得到彻底解决，有些至今仍是影响我国边疆稳定的制约因素，所以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仍有其迫切的现实意义。

六．关于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关系

研究与决策虽有密切关系，但不可将两者等同。研究的结论虽是进行正确决策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

专家的研究是解决“应该怎样做”的问题，而政府的决策则是解决“怎样去做”的问题。有时决策部门同意专家的决策，但是不能马上实施，因为决策者一方面要以科学为依据，另一方面还必须分析现实力量的对比，以及各种复杂情况。

在研究者与决策者中，决策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策部门需要有更多的政治家气度与远识，应该支持学术界百家争鸣，应该为研究者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保证。只有听取各种不同的见解，领导者才能“择其善者而从之”，才能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避免决策的失误或短视行为。

研究者应发扬中国边疆研究的爱国主义和求实精神的优良传统，以自己的高水准研究成果，为国家的正确决策提供扎实、可靠的依据。对于边疆、民族、宗教这类敏感问题的研究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回避，一种是知难而进。长期以来在“左”的路线下，人为设置禁区，许多专家的正常研究工作受到干扰，结果是我们的决策缺乏科学依据，从根本上说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利。

学者研究的学术行为和领导决策的政治行为应有一个互补的界限。专家的研究要进入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领导者要尊重学者的意见。学者讨论敏感问题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即所谓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我们认为处理好两者关系的关键是要区别研究与决策的不同内涵，正确把握它们间互补的界限。真正做到把研究者的观点作为学者的观点来对待，切切不可把研究者的学术见解，错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以过度的重视或过分的责怪。唯此，研究者才可能在边疆研究这一颇具敏感性的领域中进行大胆探索，边疆研究的繁荣也就为期不远了。

（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关于中国边疆的若干问题*

邢玉林

一、中国边疆的特殊性

一国边疆是该国领土的边缘地带,因此一般来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边疆,所不同的是边疆的类型。边疆的类型大致有以下三种:一种是双方在边疆上驻扎重兵,戒备森严;一种是双方在边疆上不严警备,移民出入、商贾往来不受严格限制;一种是双方的边疆各居相同民族,其纠纷极易以边疆民族的隶属问题为借口。上述三种类型,不妨分别称之为封闭的边疆、开放的边疆和同族跨境的边疆。虽然可以把这些国家的边疆区分为上述几种类型,但大多数国家的边疆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方面皆与本国内地没有多大差异。对这些国家来说,边疆不是一个单独的社会系统,除“在外交与国防上,容或有其突出之点”,其涵意仅指与邻国接壤的地带而已。与此相反,中国边疆的特点却十分鲜明,主要表现是:1. 面积大,边界线长。全国省、自治区总数的近 $\frac{2}{3}$ 处于边疆,总面积超过50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60%以上;有的边疆地区的面积如新疆50倍于台湾。这使国防线拉长,纵深防御难度加大,于国防不利。此外,中国边疆地区纵深幅度大,同属一个边疆地区,处于边境地带上的市县与处于非边境地带上的市县可能相距千里之遥。中国陆地边界线长达2.2万余公里,海岸线绵延1.8万余公里,有6个省面临辽阔的海域。这使我国门户众多、前沿广阔,便于对外交流和向外发展,也为设防增加了困难,稍留罅隙便予人窥视之机。2. 分布的民族多。全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的4个处于边疆,边疆地区遍布全国50多个民族;居住同一边疆地区的各民族在经济生活方式、社会文化传统等方面均有程度不同的差异。这易使各民族取长补短、集储精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也易产生隔阂乃至纠纷,民族团结遂成常新的主题。3. 地理环境各有不同的类型。陆路边疆地区或多山脉或多盆地,或处高原、草原或处高原草原,或是干燥或是寒冷或是盛暑地带,不一而足。这使我国自然资源种类繁多,便于发展多种经济,却为统一规划整体经济蓝图造成诸多困难。4. 地理位置重要。边疆地区的高山大川是中国的自然屏障,有利于国防,却不利于我边民与邻国边民经济、文化交流和往来;有些边疆地区的边境一带无天然屏障,境内境外通道四通八达,这虽有利于双方边民频繁往来,却易引发社会问题,且为边境管理增加了难度。5. 经济落后。在经济上,陆路边疆地区与内地相比有较大差距,特别是交通不发达,人力和财力不足,知识和技术有限,这种不平衡使边疆地区与内地的协同成为必然之势,但对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对我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不利。

由于中国边疆特别是陆路边疆有上述特点,因而过去乃至今天,陆路边疆与内地相比有许多特殊性,举其重要者有七。

第一,在行政管理上,边疆比内地的难度大。边疆地理状况复杂、交通落后、民族多元,又与邻国毗连,行政管理难度因此增大。历史上,历代王朝派遣边臣疆吏是维持中央与边区联系的

* 本文主要涉及陆疆问题。

主要手段,但在边疆行政管理上有卓见、有作为者不多,大多数人在施政上或“动辄擅肆淫威,竭尽剥削压榨之能事”,或“敷衍塞责,无为而治”,造成中央与边民之间的裂痕与误会,影响流长。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陆续将汉族干部派往边疆地区参与管理和施政,难免要出现一些复杂的问题需要逐步解决,例如消除少数民族对汉族干部历久传下的猜疑、隔膜,就要求汉族干部对边疆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有全面的认识,以其卓著的政绩取得他们的信任。倘若就地取材,以本地人管理本地,则需要着力培养素质高的少数民族干部,这无疑又不是一蹴而就的工程。边疆管理干部必须在文化、知识、意识和观念等方面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需要,有娴熟的操作技巧和对社会运作的整体把握能力;否则就会对经济基础进行破坏性的干预。此外,建树团结一致的边疆社会,不仅要靠国家的物质上的辅助、救济,更要靠发挥边疆地区的潜在的和区位的优势、自力更生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上述方面,边疆地区应当做的工作远比内地复杂。

第二,在广义文化的改革上,边疆比内地更有直接现实性。我们应当承认,由于历史背景不同,边疆与内地,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汉族在语言、习俗、宗教信仰等文化内涵上有显著区别,而这些区别不表明各自的文化有优劣高下良窳之分,植根于不同边疆地区沃土上和世代传承的文化对不同边疆地区的不同民族都是一种粘合剂。但是,我们也不必讳言,一些边疆地区文化包含着守旧、迷信、陋习等成分,这种文化上的缺陷,是偏僻地区的共性。由于中国历代王朝对边疆均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而文化本身在演进中又有惰性,因而不可能在短期内弥补这种文化上的缺陷。改革开放以后边疆地区的急剧变化使边疆民族在心理上出现负差感,助长了文化上的缺陷。今天,我们既然不能采取历史上有些人所主张的压制边疆文化发展、消弭边疆少数民族精神寄托的象征的同化政策,那么就要使少数民族认识文化改革的必要性而自动进行改革。这种因势利导的过程不仅是长期的、渐进的,而且涉及一系列政策界限的掌握。至于文化建设的任务就更比内地艰巨了。

第三,在地理上,边疆地理的统一性比内地弱。边疆地区既有沃洲亦有草原或森林地区乃至高原和沙漠地区,历代统治者于地利险夷、驻防兵制等方面难以亲履详勘和擘划措置,客观条件妨碍了边疆的开发和建设。边疆地区这种地理上的特点为今天分别地境的制定和实施用以防止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恶化的各项措施增加了难度,也为今天揭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规律,进而为因地制宜地建设边疆提供足可征信的依据造成了较大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地理环境与交通的限制,历史上的边疆地区往往形成了一种天各一方、各自为政的局面,造成边疆与内地难以沟通,物质和文化难以交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述历史后遗症逐步消除,缩小边疆与内地各方面的差距,首先发展沟通边疆与内地的交通和通讯,使民族之间的文化、经济的交流全方位的展开,使边疆与内地互相促进、互相补充,任务极其繁重。

第四,在社会和政治关系上,边疆地区比内地复杂得多。因为边疆与内地的关系、边疆与邻国的关系、边疆内部的民族关系、跨境民族之间的关系等等交织在一起,所以边疆地区极易引起利益冲突或剧烈的动荡。例如,历史上汉族势力伸入北疆草原后,在边疆政治机构统制下常与该地区的其他民族发生利益冲突,造成社会某些混乱。更为严重的是,历史上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贵族集团的自立、分裂和反叛事件多有发生,其原因既有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势力膨胀及外部的煽惑,也有中央王朝统治阶级对边疆地区谬判情势、措置乖方和政策失误,而这些原因无不与边疆地区的关系错综复杂有关。今天,中国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谓古今异势;但必须处理好边疆地区的复杂关系,可谓古今同理。处理不好边疆地区的复杂关系,就会出

现动荡和不安，其经济、文化发展就会受到阻碍，甚至给侵略者以踏我门户、继窥奥堂之机，使民族受到屈辱、国土遭到沦丧。处理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处理好边疆地区内部的民族关系，其中民族教育是关键。民族教育与社会生活、生产活动、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道德习俗等诸多领域皆有关联。在民族教育的指导思想、原则、制度、方法、管理等方面必须结合上述各领域加以配套，使之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适用性，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摸索规律。这是有别于其他教育的系统工程。

第五，在政制结构的功能上，边疆地区的脆弱性比内地强。历史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满族统一东北，皆赖于部落战争，使各部皆受一人统治。这些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其原来的根据地或崛起地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上造成各有区别的边疆政制就是这种极强的变化性的证明。这些不同的边疆政制，尽管有稳定边疆的积极作用，总的来说仍不乏积弊。例如：蒙古的盟旗制强调旗界，造成民族纠纷；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加深了西藏与内地的鸿沟；“回部”的伯克制，使民族积怨于将军、大臣；土司和部落制，未能确定土司头人的管辖权的范围，土司头人多无善举，易受外力诱惑而作乱。这些政制，不能使社会摆脱经济停滞、边民孤立落后的状态。今天，一些边疆地区实行区域自治，既有其历史的根源，又与过去的政制性质有本质区别。但是，仍有不少复杂的问题有待解决：如何使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权与受中央集权的制约、国家的高度统一与自治地方的高度自治的关系更加和谐，如何使自治权所需要的政策措施与之配套，如何使自治权行使得得当、运用得自如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复杂问题。而为了充分保障自治权所必须具备的制度或规定如奖励保障与惩罚保障的制度仍是空白，致使难以解决自治权行使的诉讼问题，对违反自治法、侵犯自治权的行为往往得不到法律的制裁。全面地实行边疆立法，加强中央对边疆的管理和针对各边疆社会地境、民情的不同特点制定各不相同的具体政策无疑是复杂而艰巨的工作。

第六，在经济发达水平上，边疆地区比内地低。自然地理的和民族历史的诸多因素，造成边疆地区经济数量和质量的落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带的地缘优势和得到的政策优惠，又使边疆地区与上述地区的经济差距拉大。如果这种差距继续拉大，那么就会妨碍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宏观经济效益的迅速提高以及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国家实行经济战略目标的转移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困难很多。

最后，在国际关系上，中外交涉多缘起于边疆（陆疆和海疆）地区。众所周知，凡是在边疆地区接壤的邻国越多的国家，该国与众多邻国的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关系越是复杂，即是说，这种一国与其众多邻国的友好或敌对关系可以在边疆的布局上得到明显的反映。尽管中国邻接的国家有 12 个之多，中国与邻国的边疆关系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仍十分简单，这是因为邻国多处于附属地位，边疆地区或荒漠或山岳，许多国界未加勘查，边疆没有重兵驻扎。然而，正是中国与邻国曾有的这种简单的边疆关系是造成后来边界纠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在边疆地区引发的中外交涉不仅极为复杂而且不断扩大。除中国与其邻国多有界务交涉外，日本对中国东北、蒙古、台湾，英国对中国西藏，法国对中国西南边疆皆曾染指，中国国土被掠夺、民族被分化、主权被动摇，严重妨碍了国家的安全。今天，无论中国同邻国是否签订了边界条约、是否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边界问题上都有可能祸起隔邻。其理由至少有三：其一，从边界的特点看，当边界的划分与双方领土归属相符时，边界相对来说呈现静态。问题在于邻国在未来可能出于军事和其他方面的考虑对划分边界的条约重新“解释”，使曾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边界划分很难维持，边界的静态就仅具阶段性。另一方面，当双方未划定边界，即双方维持自然边界线或习惯边界线时，边界的静态不会长久，边界争端再开并非永无可能。其二，当前

国际关系出现了对话和缓和趋势，各国都利用和平环境致力于经济建设；但是，这种政治层面影响经济层面的单向关系也有可能逆转。经济上的需求破坏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进而导致战乱的历史现象并非鲜少。在未来，某邻国为摆脱无休止的索取自然却又无力补偿自然并因此受到自然的报复的困难，也有可以挑起以占有自然资源为最终目的的边界或海域争端。其三，中国与邻国在政治传统、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或不尽相同或有根本区别，加上邻国国内政治形势有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并非永无可能。

二．中国边疆与中国各民族和国家的关系

中国边疆成为国家领土的边缘地区，是中国各民族长期活动的产物，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即国家的疆域不断变迁的结果。以下从历史的角度概述中国边疆与中国各民族和国家的关系。

（一）中国边疆与中国各民族相系始终。

阐明这种相系始终的关系，应以中国各民族是一个整体为前提。关于中国各民族一体化问题，费孝通、张博泉、陈连开等先生曾有详述。笔者所要指出的是两个重要的事实：其一，远不说禹与戎族有关联，戎与夏本出一源，仅就秦汉以降至清而言，两千年来在中国领土上一家人的征战、民族的迁徙和融合以及民族间的通婚，不仅造成民族居住区域的屡屡变动，也使中国各民族在血统上并无严格分别，汉族血液里有其他民族的血液，其他民族血液里也有汉族血液，血统相同的集团即种族几不存在。其二，民族一体的标志并不在于语言一致、宗教信仰一致、生活习惯一致；换句话说，上述方面的差异同样可以使一个国家的民族成为欣欣向荣的统一体，这在许多国家都是如此。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主要标志在于：一是有共同的历史（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荣辱与共、甘苦共享的历史）；二是有大家庭的意识（中国各民族可合不可离，内部或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这是自己家的事，内部事务不许外人代谋，共度危机、同赴国难已为历史所证明）；三是有统一的大义（共同御敌，反对分疆裂土乃至国家分崩离析）。

在上述前提下，很容易理解中国边疆与中国各民族相系始终的关系，下择要阐述之。

首先，中国各民族缔造、开发和经营了中国的边疆。中国各民族的分布与中国边疆的范围相吻合是中国各民族两千多年共同努力的结果。众所周知，相传活动于黄河、长江之间的伏羲、神农、黄帝三大支先人经黄帝统一，继滋延四方，逐渐适应不同的居住环境而在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等方面彼此不同，遂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族姓。其中活动于中原的民族，自秦汉迄清各代充实扩大，形成汉族；活动于东北地区的民族，由挹娄、勿吉、靺鞨和渤海以及女真与乌桓、鲜卑、奚、契丹汇合形成满族；活动于北方和西北一带的民族，由匈奴、突厥、回纥、畏兀儿形成维吾尔族；由成吉思汗扩充其前各代绪烈形成蒙古族；活动于西部的民族由羌等民族而逐渐演变为藏族；活动于西南一带的民族则形成苗、徭及掸两系。上述同出一源的中国各民族的各宗支，或“撑持于旷荡荒凉的大草原”或“驰骋于冰天雪地的山峡下”或在鹿狂莽莽的环境中，剪除荆莽、开辟洪荒，不断经营，渐臻成效。早期处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各民族为推广农业，向南方、东南方不断扩展，在政治、地理上均不会受到限制。这不仅使南方、东南方渐成有广度、有深度的边疆，也在这些地区有限度的推广或修正了黄河流域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促使城镇的兴起、政治统治的确立。东南一带在公元2世纪时还是穷乡僻壤，到12世纪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发展中心之一，其主要原因便在于不断迁徙的中国各民族的开拓，其中包括地理和气候的变化，迫使古居于乌兰布和沙漠而后退至东南一带的民族的开拓。在北方内蒙古，在西汉时曾有40

多座城市，每座约 1 千户，这些城市均是公元前 2 世纪或公元前 120 年的移民兴建的。在新疆西北部，汉代时的田园和塔里木盆地在公元前 1 世纪的一条 100 多公里长的古运河系统的建设也得益于当地民族与移民。类似上述局部的变化举不胜举，已为考古材料所证明。中国各民族历几千年的努力，使边疆不断拓展，并且造就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奠定了边疆不同的人文景观。他们留下的边塞诗、边关曲充分反映了他们开发、经营边疆的奋斗历程和他们对自己生息、活动和奋斗空间的赞美和热爱的真情实感。由此可见，同出一源的中国各民族活动范围日广，中国的疆土日扩，昔日孤悬绝朔，渐成中国边陲，中国各民族在缔造国家疆域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辟土开疆的爱国意识。

第二，中国各民族促使边疆社会发生变化。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经营是以边疆民族为主体进行的，而边疆地区的社会变化则与中国各民族的活动分不开。

在北方，农耕民族进入草原造成草原农耕与畜牧并重，或农耕民族放弃农耕而专事畜牧；另一方面，有些游牧民族则受农耕民族的影响促成了畜牧兼农耕的混合经济，或专事农耕。从整体上看，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比重的大小恰恰决定了草原民族移动性的强弱。这虽然是 20 世纪的情形，但可以说民族的迁徙和各民族的交往造成了边疆地区经济方式的变化。

在南方，农耕民族的迁入造成了农耕的推广，这种农耕经济的主体离不开土地的固定性，势必使强化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成为必要，加深了边疆与内地经济互相为用的关系，从而使边疆和内地紧密地联系起来。这说明民族迁徙和各民族的交往促使边疆与内地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东北，农耕民族的存在和介入，不仅使森林地区的狩猎民族和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因必须与农耕民族进行经济交易而更加接近农耕民族和其永久固定的土地，促使狩猎和游牧民族对农耕的重视，甚至加大了农业经济职业化的比重，而且造成了东北边疆社会分工的变化：缩小了妇女事田、男子狩猎的分布；出现了农人和猎人，狩猎渐成王公贵族的权利，扩大了阶级差别（满族便是这样）。这说明，民族迁徙和各民族的交往造成了边疆社会内部分工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在西南，各民族在开拓西南的过程中，民族的特点往往决定该地区的社会状态，这以西藏最为典型：西藏边缘上的民族或部落逐渐“形成了势力中心和社会团结，使其有能力将其活动范围扩展到高原中部”；另一方面，由于民族或部落散漫、地方组织脆弱、交通不便，因而没有形成典型的游牧民族也没有相互联系密切的农业网。上述状况，很难使西藏发展成为由统一的国家机构管辖的一元化社会，在较长的时期，超越世俗政权权力的教权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又说明，开疆拓土的民族的特点决定着该疆土的社会状态。

第三，中国各民族捍卫了中国的边疆。近代前后，桀骜列强觊觎、蚕食中国疆土，边疆地区首罹其难，中国各民族在捍卫中国边疆的斗争中谱写了威武雄壮的篇章。在东南沿海：14 世纪至 16 世纪，倭寇杀害江、浙、闽军民数十万，以戚继光为代表的各族儿女抗倭 12 载，平息了 200 余年的倭患；郑成功率军收复了荷兰殖民者侵占、统治了 38 年的台湾；19 世纪 40 年代至 19 世纪末，英、日侵略者相继从海上入侵中国，在海战中，关天培和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以及邓世昌均血洒海疆。在西北边疆，19 世纪 70 年代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进兵伊犁，均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抵抗，左宗棠顺应历史大潮进兵西北，新疆得以收复。在西南边疆：1874 年景颇人痛击英国武装“探险队”入侵；1888 年西藏官兵死守隆吐山；1903 年西藏军民与英军血战江孜；19 世纪 80 年代冯子材领导广西边民抗击法国侵略者，威震镇南关。在东北大地，17 世纪 80 年代沙俄盘踞雅克萨，三次血洗海兰泡，制造江东六十四屯惨案，东北各族人民和爱国官兵